

目 录

忆方振武将军.....	陈敏之 (1)
缅怀宋哲元将军.....	李世军口述 (13) 蔡德金整理
怀念前驻苏大使邵力子.....	李修业 (18)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回忆片断	
回忆邵力子和傅学文先生创办力学小学.....	徐恭让 (26)
我的爸爸谢玉芝的一生.....	谢锡祺 (29)
蒋介石是怎样诱捕龙云的.....	李修业 (40)
龙云被逐前后见闻.....	鲁昌文 (49)
我是怎样逃出南京的.....	龙 云 (53)
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内幕.....	卞稚珊 (56)
藏本英明事件的来龙去脉.....	金 勤 (77)
有关CC点滴见闻录.....	黄应昌 (87)
CC集团在江苏的励进社.....	张正非 (103)

抗战前“中统”在南通的活动…………… 姜颂平(129)

我所知道的青红帮…………… 崔锡麟(139)

漫谈青红帮…………… 杨方益(189)

附：向春亭谈青红帮…………… (225)

(杨方益根据一九六五年谈话笔记整理)

回忆南京江南汽车公司 …………… 徐泰来(232)

附：江南汽车公司内幕…………… (251)

忆方振武将军

陈敏之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后，反动势力疯狂地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武汉的青年学生大批地被逮捕被杀害。在这种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投奔了西北军方振武部队。当时我刚二十四岁。

方振武部队第一军当时驻在湖北樊城。该军军长阮玄武是我的同乡前辈。我一到他那里，就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当他知道我是从武汉前来投奔部队的，笑笑说：“会干政治吧，咱们部队也有政治部。”不几天我就被正式委任为第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

我到了部队就发现这支部队素质很好，多是直、鲁、豫的青壮年，部队有威武雄壮的大刀队，有强大的担负运输任务的骡马队。尤其令我有新鲜之感的是，部队包括政工人员在内，天麻麻亮，就被号角声、歌唱声唤醒，参加西北军传统的“朝会”。部队步、骑、炮、工、辎兵种齐全。方振武将军统率有三个军，还有新兵师、骑兵旅、特务团等，计有五万之众。

这是一支不可小看的军事力量，“一旦小卒子过了河，也能拱掉老将”，蒋介石老是要盘算方振武，原因正在这里。

“方老总”的脾气

方振武从来就瞧不起蒋介石，他常常对自己的心腹将领说：“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蒋介石还在上海搞交易所呢！”方振武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经带兵进攻南京城。尔后又在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举兵北伐，带兵攻入江西，立过战功。他自恃老革命，当然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可是蒋介石拥有政权、财权、兵权，在力量的对比下，他又不得不巧于周旋，保存自己的实力。而且在新旧军阀的混战中，所谓鹿死谁手尚不可知。方振武以他的机智，从容不迫地对付着蒋介石的纵横捭阖。他从来不称呼“蒋总司令”，而只是勉强地称呼“介石同志”。他的将领常常说，这就是“方老总的脾气”。也有些老于世故的僚属埋怨他：“人家是总司令，你不过是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胳膊能拗得过大腿吗？”不过，我们当政工人员的，倒是十分赞赏方老总的这个脾气，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直接挨到蒋介石的两把刀子：一割灵魂，二割脑袋。

历史的曲折 番号的变更

这个部队原来属于西北军，以后又不属于西北军。方的老部下都熟悉这段历史。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方振武对他的部下及其将领说：“我方某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从今天起立即行动起来，与冯玉祥的国民二军靠拢、合作。”接着他在山东郛城发出了通电，宣布改为国民军（即西北军）第五军，并由冯玉祥通过当时的“执政府”，任命方振武为直鲁豫边防总司令。三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

一周年，方在顺德还召开军民大会进行纪念。

方振武自从加入西北军后，在与奉军、直鲁联军的反复较量中，都身临前线负责指挥。由于国民军一再失利，冯玉祥宣布“下野”赴苏联游历去了。

当西北军处于困境，精锐部队和重要装备损失很大的时候，独有方振武所带的第五军还象个军队整整齐齐的，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开到五原进行休整。

一个月后冯玉祥从苏联回来了，他偕同共产党员刘伯坚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人来到五原。九月十五日那一天举行阅兵式，冯玉祥和苏联顾问特别称赞了方振武部队。九月十七日，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誓师大会，冯玉祥在大会上宣布国民军全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接受孙中山先生亲手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冯玉祥、方振武、阮玄武等都庄严地宣了誓，他们的誓词是：“……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当时的政治气氛很浓，革命热情很高。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政治风向突然变了。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后，施行各种反革命策略，从而导致局势大变。冯玉祥同蒋介石联系后，遂把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并把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刘伯坚等“遣”走。这是大起大落的历史性演变，从此就转入了大小军阀势力时分时合、逐鹿中原的混战局面。

由于历史的曲折，给方部带来几次番号的变更：初为“国民第五军”；在冯蒋合作时即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部队到达湖北襄阳、樊城后，遂正式宣布脱离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接受武汉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中央直属第九方面军”番号。当时在方部中的有识之士，都为如此大起大落的历史性演

变，不胜唏嘘叹息，他们担心日趋激烈而又复杂的混战局面何时有澄清的日子？可他们对“方老总”还是信任的，相信他不会背弃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把部队引向祸国殃民的邪路上去。

火车上的一次会见

大混战中走马灯式的人物，时而“下野”，时而上台；时而联合，时而分裂；时而握手言欢，时而火拚厮杀。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蒋介石宣告“下野”，东渡日本，实际上他把讨伐唐生智的军事部署早已策划好了，由桂系部队开进武汉，并拉拢方振武，由“军事委员会”给以“讨逆军北路军总指挥”的名义，兵分三路分别由汉水和襄阳花园公路向武汉进军。其实，所谓“讨唐”并未接火，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我随军出发，到达旧地重游的武汉，回想一年以前大革命时代的火红年月，不禁感慨系之。当部队开拔时，我匆匆地上了路。就在开往孝感的火车上，方振武特地约我到他的车厢里作了第一次的正式会见。

“阮军长早就同我谈到你，你们搞的宣传品，我也看到过，唐孟潇（即唐生智）的标语不要再贴了，我的意思你懂吗？”我点点头。他又说：“你读过《三国演义》吧，你顶佩服谁？”当时我很难作出回答。接着他又笑着说：“我们搞过五原宣誓，开会挂过列宁像，可今天我们同蒋介石搞在一起，打唐生智，你说怪不怪？”接着他叹了一口气。当时他的表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分手时他讲的话我也记得清清楚楚：“我们部队开到孝感、广水休整，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也要集训一下，你年轻，要多担当一些责任（到了信阳果然宣布我为集训大队长）。记住，我们这个部队很穷，靠对孙中山

先生三民主义的信仰，靠严明的军队纪律，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才不至于被人家吃掉。孔明这人真了不起，对付曹操，对付孙权，他都有一套锦囊妙计。难哪，棋错一着，满盘皆输。”他讲的这些话颇耐人寻味。分手之后，我在和他的老部下谈天时，他们说：“方爷碰到蒋介石这个对手，的确难办，他真把心操碎了。蒋介石有地盘，有实力，有金钱，有美人，而且又有外国老板撑腰。更叫人感到十分棘手的是，这人毫无信义，什么样的毒辣手段都能使得出来，稍不小心，部队即被吃掉。所以他提到孔明，意思是说对付蒋介石要老谋深算，谨防受骗上当。”我来到这个部队几个月，感觉到大家都有一份心事，担忧时局乱糟糟的，能不能找到一个立足之点，既能生存，又能发展。

一个师的精神面貌

不久，我就调职了，改任师政治部主任，师长是余亚农。时在一九二八年二月，蒋介石下令“北伐”。这时方部又改了番号，编为“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指定由砀山经单县、金乡向济宁进攻。正面的敌人是旧军阀孙传芳，在鱼台、金乡、羊山集一带布下了坚固的阵地。余亚农所部第九十五师，归第三十四军军长阮玄武指挥，阵地摆在金乡一线。

当我来到师部门前，一位长官迎了出来，连忙把我手提的行李接了过去，“欢迎你，陈同志，我就是余亚农。”这位师长对人很热情，他中等身材，长脸，额上刻有几道皱纹。我们谈了一阵子，他的坦率，使我消除了突然改变工作环境的种种顾虑。可我没有料到，就在当天下午，他对我来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测验”，他说：“我们同到火线上走一走好不好。”接着他骑一匹大青马，让

我骑一匹比较驯服的小黑马，还有参谋人员陪同，前往前沿阵地。行至丛林间，三三两两的团营级指挥人员迎了上来。我看到他们很镇定，在敌人阵地的机枪瞄准之下还谈笑自若。师长边走边拉着我同下战壕，并对士兵问长问短，有说有笑。在回师部的途中，师长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人家讲你们这些秀才们欢喜纸上谈兵，今天请你陈主任来试一试，看你有没有胆量上火线。我们这里当大兵的，个个都瞧不起怕死的胆小鬼。如若你是这种人，我们就把你象神一样供起来。”我从下师部第一天起就开始形成了这个印象：在这个部队里，将会带兵，兵会打仗。以后在同余亚农共事中了解到他和方振武同是安徽寿县人，也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同盟会会员。余亚农对西北军掌故很熟，我提到冯玉祥，他说：“冯同方在带兵、练军、治军以及指挥三军作战方面都是高手，并且两人都有雄心壮志而又是足智多谋的人。可惜的是，冯在五原誓师大会上表现很‘左’，后来同蒋合作，情况就变了。不久，方振武率部出师襄樊脱离了冯部第二集团军。这回又跟蒋介石在一起‘二次北伐’，以我们的部队而论，将是良将，兵是好兵，打掉孙传芳、张宗昌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仗打赢了，蒋介石的地盘可能扩张到山海关以外，我们这个部队将上哪儿安身呢？唉，前途难说啊！”

愤怒地踏过泺口大铁桥

我们的部队在攻打孙传芳的战役中，以羊山集一带的作战胜利而告终；接着转向津浦线以东的直鲁联军进攻，张宗昌溃败而逃，我们乘胜追击，很快就到了济南附近。五月三日清晨，部队进入市区，我和师政治部几位干部也随军赶到了商埠，边走边贴

标语。突然枪声大作，商埠乱成一团，日军追杀过来，干部小孙朝敌人放了几枪，接着跟上来的士兵同日军交起火来，我们几个人退到通远门内一所小学校里暂时隐蔽起来。此时枪声、炮声不绝于耳，战斗异常激烈。我军工兵连和手枪连与敌人交火，牺牲很大。尽管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但我军官兵义愤填膺，坚决要打。

日军杀害济南成千上万的军民，又杀害我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并向蒋介石提出了最后通牒。就在如此严重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竟然无动于衷，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对日方坚决妥协，屈膝到底。五月五日，他在离济南城不远的党家庄召集了各将领会议，冯玉祥、方振武赶来参加，一致主张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退日军的进攻，但蒋介石抱定宗旨不准抵抗，下令绕道渡过黄河，继续“北伐”。我军全体将士极为愤慨，眼里含着热泪，愤怒地踏过泺口大铁桥向德州进发。

部队在行军中，一路上大家议论开了：“什么北伐北伐的，还不是给蒋介石打天下，扩充地盘。”“蒋介石是新军阀，比旧军阀好不到哪里去，为他卖命真不值得。”部队憋着一肚子气和牢骚过了黄河，经禹城、平原来到德州。

我们政工人员不顾行军的疲劳，立即投入慰劳部队的准备工作。这时我又从师部调到总指挥部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工作更加紧张。我们立即动手搭个土台子，准备表演一些节目；同时组织力量，凡是会画画的，会编大鼓词的，会说山东快书的，会演活报剧的都开动起来了。中心内容突出“五三”惨案和党家庄各将领会议，剧中有一段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动人演说，顷刻激发了全场爱国健儿的志气。这个部队有一股潜在的力量，将士们又都有爱国的热忱，确实是人民可以信赖的一支队伍。但它走向何处去保家卫国尚难逆料，连方振武自己也常为这个问题困

惑着，苦恼着。

混战中的暂时喘息

“二次北伐”快要接近尾声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撤回徐州以南，只有杂牌部队渡河继续北进。残敌直鲁联军张宗昌被迫放弃天津，孙传芳也逃往东北。不久方振武部队到达天津、北平，分驻黄寺、古北口一带，总指挥部设在北平西直门内旧庆王府。这座清朝王爷住过的豪华屋宇，室内雕梁画栋，陈设古色古香，到处可见“龙飞凤舞”，引人遐想联翩。方振武深恐总指挥部八大处官员“享受过分”而削弱斗志，经常在“朝会”中发表演说，告诫部下不能忘本，切不可忘记了老百姓的疾苦，丢掉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他在列举反面的教材中，往往影射蒋介石及其政府加以谴责，有时还动起肝火，激昂慷慨，怒斥向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的可耻行为。

在北平驻防几个月，他让我接任总指挥部政治部代主任。三军和各师的政工人员都分散在黄寺、古北口、密云等地，我只能照顾留在北平的一小部分，日常的工作也不过同一些群众团体和有关政府部门联系联系。有一次我陪同方振武到辅仁大学演讲，美国教师把他同冯玉祥同等看待，认为他是抗日的著名将领。当他走出校门时，受到学生和教师的热烈欢送，他最感到欣慰的是，青年学生对他在山东济南坚决主张打退日本侵略军这一爱国行动的肯定，因而对于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也表示深切的同情和理解。

当时，在北平的方振武已是四十二、三岁，正处于壮年时期，他饱经忧患，阅历很深，有一整套的治军经验，但对复杂的政治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还“缺乏主动性和战略远见”。他防范蒋介石

石甚严，决不让一个特务和坐探混进来对他的部队进行分化瓦解，与此同时他又同蒋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暂时忍让以待时机。方最忧虑的是唯恐他的部队被人吃掉，所以他尽量争取“军事联盟”，以免陷于孤立。他在旧庆王府设个“招待所”，有食客，有谋士，有来来往往的政治掮客，其中包括冯系、晋系、桂系等等方面的代表。方所委派的“参议”，有郝兆宣、楚明善等人，都是搞纵横捭阖的谋士。这些，在当时都是保密的。

一九二八年初冬，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张继来到北平专程看望方振武，昔年同是同盟会会员，少不得要招待一番，方亲自主持宴会，我也在座。在闲话农村混乱情况时，张继把一切罪过归之于农民的“暴乱”，当时我略略讲了几句，地主拥有武装，私设公堂，压榨农民，这些也是事实。张继怪我顶撞了他，回南京后宣扬方部有共党分子潜伏，并给方振武来了一封信。方接信后颇费踌躇。有一天，我去见他，他说：“你还年轻，才二十几岁，提拔是快了一点。南京方面传来的指责，都不会改变我对全军政治工作人员的信任，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不管南京怎么指责，我都不会做出过头的事。说句良心话，共产党就是穷党，孙中山先生主张联共，就是这个道理，何况我出身贫寒，不能忘本。”方部有中共的地下组织，党员有王梓木、廖运周、史直、王汉三、方略等人，他们分别是总指挥部参谋处、政治部或军部、师部的骨干力量。方振武对这些同志很关心，很爱护。但不时有人告密，南京官方也多次来电要人，方以“查无此人”，回电了事。

囚禁——改变不了将军的意志

蒋介石在“二次北伐”取得胜利后，又说通了张学良，于一九

二九年十二月宣布东北易帜，很快就腾出手来，谋划暗算他的大小对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方振武等军事实力集团。第一着就是编遣会议，“编”是加强自己的嫡系实力，“遣”是裁减异己的力量。方部只编为两个师，原来是总指挥，编后成为一个师的师长，同他的老部下阮玄武平起平坐了。蒋介石蓄意抬高阮玄武，从中制造矛盾和磨擦，以达到分化瓦解方部的目的。阮玄武识破了蒋的离间之计，仍然以第四十四师师长的地位接受第四十五师师长方振武的指挥，蒋的阴谋诡计暂时未能得逞。

编遣之后，中原逐鹿的混战局面就开始了。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软禁李济深于南京汤山，随即下令讨伐李（宗仁）、白（崇禧），原来被“讨伐”过的唐生智又出来为蒋效劳了。方振武也被发表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在讨伐李、白中，冯玉祥两面都不插手，坐山观虎斗。蒋恨冯入骨，是年五月对冯又下了讨伐令，又同样使用分化、收买老一套的诡计，把冯的两员大将韩复榘、石友三收买过去了。李宗仁、冯玉祥都是被蒋介石的收买政策搞垮了的，方振武明明看在眼里，但却没有警惕到下一步就轮到自已了。

原来，方振武曾经渴望当上山东省主席，他幻想自己拥有津浦铁路大动脉和烟台、青岛的出海港口，可以有个回旋的余地，逐步摆脱蒋的控制，自成“气候”，一则以求生存，二则以求发展。可是，蒋介石却偏偏发表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方振武为安徽省主席，其实这是擒虎的诱饵，把包围圈缩小到可以随手擒拿的地步。方振武虽然有所戒备，但他也有个想法：钻到蒋的肚皮里，见机行事。方这人自信甚深，还是不把蒋介石看在眼里，在他去安徽以前就和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等人暗中作了反蒋的酝酿和准备。

一九二九年八月，方振武把部队调遣好，陈兵蚌埠、合肥、安

庆、芜湖等地，蒋介石也作了针对性的调防，双方的部队犬牙交错，成了互相防守、牵制的局面。

方到安徽就职，只有三五旧属如方植之、苏宗輶、孙养雍、郭子清等人作为省府委员，省府的秘书长徐衍东、民政厅厅长吴醒亚、财政厅厅长袁励宸、建设厅厅长李范一、教育厅厅长程天放，全由蒋介石派定。但“皖人治皖”的呼声和家家户户的爆竹声，把“我们的方总指挥”迎接到了安庆，盛况空前，这比农历“玩龙灯接财神”还要热闹多了。当时我也作为方的随行人员之一，想不到今天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来叙述当年这一番热闹的场景。

蒋、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池塘中的微波也可以翻腾起来成为大浪。一天，我到厕所意外地看到三、五青年脚戴镣铐，经了解是“共党嫌疑犯”。方振武知道后不假思索地下令释放。这可不得了！CC分子头领邵华便大做文章，攻击方包庇“赤色罪犯”，并利用安徽省党部办的《安庆日报》对方指桑骂槐，造谣污蔑。方看到报纸极为震怒，更加对蒋齿冷，决心在蒋的心腹之地举义。此时，全国反蒋的空气日益浓厚，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在南北酝酿策动。方观察时局动静，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派出代表同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等人取得联系，不料泄漏了机密。方振武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九月二十五日，方振武应蒋的电话邀请到南京开会，次日晨乘安丰兵舰东下，到达南京后蒋把方软禁起来。我离开安庆到了上海后，听到了有关方振武被囚的经过，蒋一度要枪毙他，但他很倔强，始终没有改变反蒋的初衷。

我在这支部队不过一年零几个月，时间是很短暂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接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也是极其深刻的。这对当时的一个青年来说，需要锤打、锻炼，有此一段经历，也是至可宝贵

的。高兴的是，一九三八年我在汉口天主堂医院会见了阔别十载的老上司，在我们亲切谈话中，了解到他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脱离缙绅之灾，获得了自由；一九三三年同冯玉祥、吉鸿昌共同组建和领导察北抗日救国军，这次举义又被蒋介石勾结日军，内外夹攻搞垮了；失败后他突破了蒋的天罗地网逃至香港，转游海外，在英国、意大利做了大量的宣传抗日工作，并广泛地交了许多进步的朋友。在分手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蒋介石是民族的大罪人，有好多机会都没有把他搞下来，包括冯玉祥和我在内，都对他防备不严，斗争不狠。苦的是我手下的人才太少，那时你也太年轻了。这次我从国外回来，还是冤家对头，蒋介石怎么也不让我掌握军权参加抗日战争。”他继续苦笑笑，接着说：“只给我军事参议院参议的空头名义。我告诉他们想把我姓方的关进画眉笼子里，这可办不到，我还是要飞的。”

飞到哪里去呢？据说他终于被蒋介石暗害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深深地怀念这位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和民主革命斗士。

缅怀宋哲元将军

李世军口述 蔡德金整理

我和宋将军是北伐时在战场上相识的。从多次交谈中，其梗介刚正、厚重寡言的气质风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戎马一生

将军号明轩，一八八五年十月三十日出生于山东乐陵县村学究家庭，幼承庭训，能熟读《四书》、《诗经》、《尚书》、《春秋左传》、《袁王合编纲鉴》诸书。曾继父业任教乡塾二年。慨国势凌夷，立志从军报国。一九〇七年考入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学习五年。初服役陆军第六镇见习、哨长等职，旋随禁卫军第七师冯玉祥团属，任连、营长。勤奋机智，先后以剿匪、平张勋复辟乱，迭著战功，升团、旅长，号称冯玉祥部“五虎大将”（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刘郁芬）之一。

一九二六年冬，冯（玉祥）、孙（岳）、胡（景翼）联合倒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宫之“首都革命”后，任国民一军（冯玉祥）第十一师长兼热河都统。

一九二七年春，冯、张（作霖）内战失败后，冯下野去莫斯科，宋继领残部退驻绥远包头，整军待机再起。九月冯回五原，誓师

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宋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由宁夏出师，解围了被刘镇华围困八月之西安，随即东出潼关，协同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蒋)，迅速扫除了盘据豫鲁之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褚(玉璞)联军，完成国民政府初步统一局面，宋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一九二九年冯、蒋因编遣会议发生矛盾，冯回陕西，策划军事反蒋，其部属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倒戈，冯下野被阎锡山软禁山西。宋第二次继领余部，大力整顿后方军政。十月冯又令宋出兵潼关反蒋，败绩。一九三〇年春，冯、阎联合讨蒋，时值陕甘连年饥荒，宋对连年用兵深感踌躇，但基于对冯忠诚，仍倾全力以赴，任东路军总指挥，迭创中央蒋军陈诚、张治中、顾祝同军于陇海路东线。蒋亲临归德督师时，在马牧集车站，宋出奇兵，蒋几被俘。八月下旬，津浦北路晋军溃北，张学良入关援中央军，冯部吉鸿昌、梁冠英、王修身、孙连仲及其手枪旅长季振同等归编中央，冯只身逃晋，宋与残部且战且退入潼关。杨虎城军由商雒侧翼攻入西安，时陕甘地方武装蜂起反冯，宋于四面楚歌中与少数部队渡河至晋南。残部万余，一致推宋继续领导。经其大力整训，一场大火后的余烬，逐渐形成星星火种，成为尔后华北较有实战之一劲旅。宋于历年内战痛定之余，毅然通电听候中央受理，电文有“今后誓不参加任何性质有损国家人民的内战”语。中央嘉其治军、从政有方及北伐功绩，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二十九军，下辖三个师：——三十七师冯治安，三十八师张自忠，暂编师刘汝明，先后驻晋南各县，晋东阳泉。在万分艰困下，宋日夜亲下连队督促训练，常以“枪杆子只对外不对内”为口号勉励士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翌日，宋集合全体官兵痛述国

难当头，正军人报国之日，勉励部属枕戈待命，有“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之慷慨誓言，并于即以全体将士名义通电请缨。

一九三三年春，日寇入侵热河，守军汤玉麟、万福麟、王以哲部溃走，敌以两混成旅团主力，纠集伪满、伪蒙军共七万之众，继续南犯。三月九日，前锋已陷入喜峰口侧翼阵地，南京政府授宋以华北第一军团长，令率二十九军驰击。宋亲临喜峰口指挥，从三月九日起至十九日，先后利用夜战迂回，在喜峰口、罗文峪激战中，以大刀、手榴弹，对敌人坦克、大炮、飞机，毙敌五千以上，逼敌全线溃北。此即敌军方惊呼为“皇军一场恶梦”的喜峰口大捷。一战振国威，中央授宋青天白日勋章，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委员。《塘沽停战协定》签定后，宋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继续整训部队，防敌西犯。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后，日本借口宋哲元威胁皇军，要求二十九军撤离华北，南京政府有人也曾建议调二十九军参加“剿共”者。蒋介石在成都得知宋在天津声言“誓死抗日，决不离开华北”的表示后，随即发表宋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主任，河北、北平省市主席、市长，平津卫戍总司令，授权负责冀察防务，与日方周旋。在此一二年期间，宋为执行中央对日“缓兵备战”政策，颇受国人指责。尔后，自芦沟桥打响全民抗战第一枪之日起，先后任第一战区第一军团总司令，战区副长官。其所属二十九军转战平津、冀、鲁、苏、皖、豫、鄂，直至日本投降之日为止，官兵殉国者自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以下约计十万之众。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五日，将军病逝于四川绵阳，终年五十六岁，弥留之际仍殷殷嘱咐冯治安，勉以“服从统帅命令，以死报国”。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国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分别輓曰“孝友忠贞”、“天地正气”。